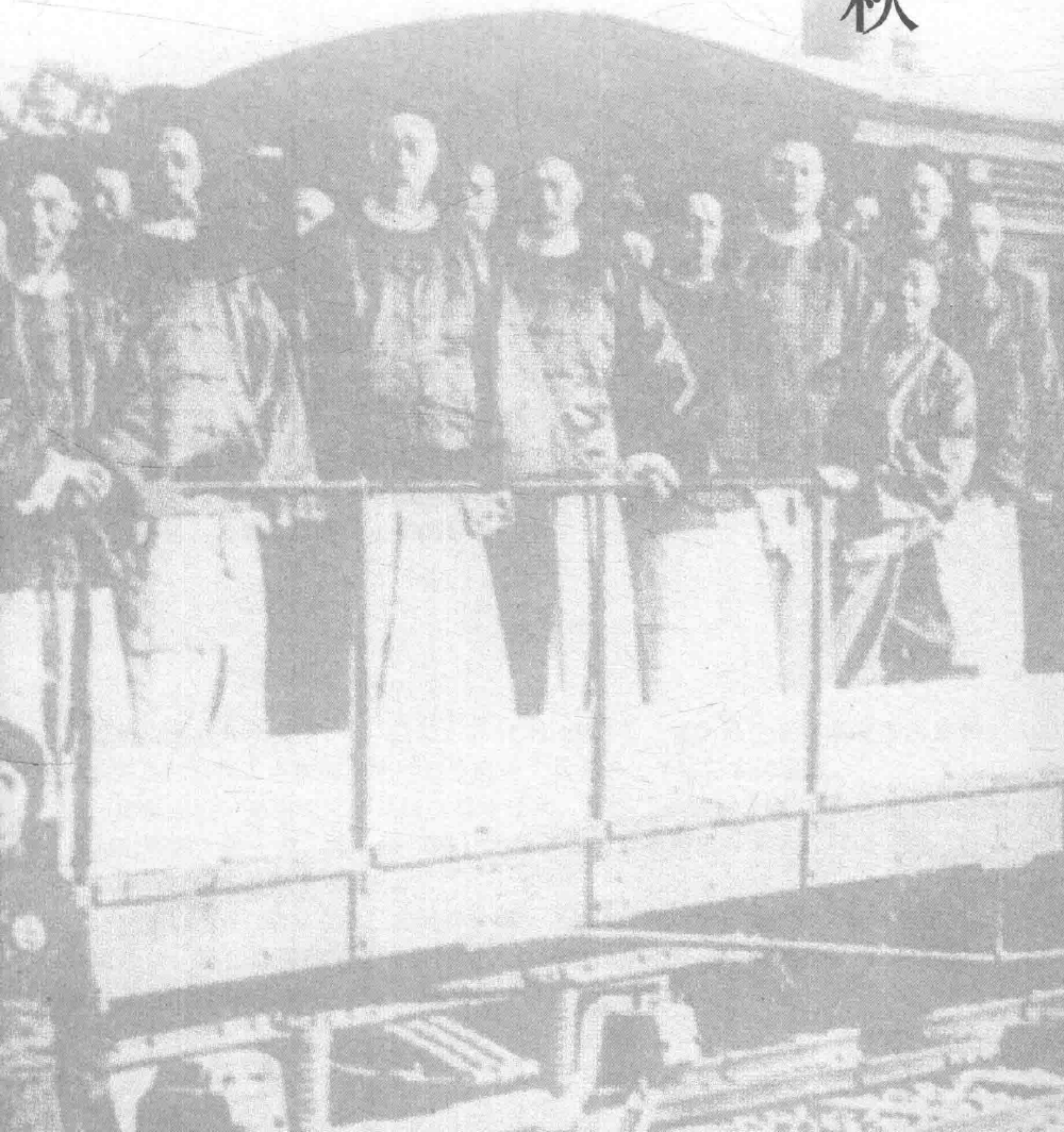


人物春秋



容 閔 传 略

苏鼎常 唐仕进

容閔（1828—1912），是我国近代史上较有影响的人物。他在政治舞台上活跃了近六十年，先后经历了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运动、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等重要的历史阶段。他早年留学美国，在美国高等学府毕业。他一生的活动，对我国近代留学教育和中外的文化交流都作出了贡献。

容閔积极主张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以发展中国资本主义，迫切要求改变国家的政治现状。他同情广大劳动人民的疾苦，并为改善人民的生活状况而作出努力。指导容閔一生活动的思想是爱国主义，特别是他晚年走上了支持孙中山武装革命的道路，可算是他爱国主义的最后归宿。

一、家 世

清道光八年十月十一日（1828年11月17日），容閔诞生于广东省香山县境内波罗岛的沙尾（今珠海市南屏公社南屏大队）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南屏容姓，是南宋末年从新会荷塘迁来，其后子孙繁衍，到19世纪初年，已成为南屏四大姓（容、林、张、郑）之首，人口发展到近一千人。容閔一代，已是南屏容姓始祖的第十六代孙。

父亲容丙炎、母亲林氏，容閔排行第三，上有一兄一姐，几年后又添一个弟弟，一家六口，靠父母耕种三至五亩薄地，农闲时伐薪捞虾，以补生计。由于容閔的叔父无子，容閔的弟弟过继给其叔为嗣子（不久夭折）。

容闳按辈分属“达”字辈，其兄取族名“达苗”，容闳取族名“达萌”，以后容闳又取号为“纯甫”。

容闳结过两次婚。第一次是1868年在上海，当时容闳已40岁。妻子郑氏，苏州人，当时20岁，据说由容闳在上海的好友徐润（香山人）作伐撮合。第二次结婚是1875年，容闳在美国负责中国留学生事务，由一位美国牧师撮合，与克洛小姐成亲。当时克洛小姐24岁，其兄是文学博士。

容闳有三个儿子：长子若兰，是原配郑氏在上海所生，后回原籍成亲，现在南屏、香港、澳门、浙江等地都有若兰的后裔。次子觐彤、幼子觐槐均是克洛女士所生。容闳给这两个儿子都取了外国名字：次子叫马礼逊·布朗（Morison, Brown）意在纪念他在香港读书的马礼逊学校以及带他去美国留学的布朗校长；幼子叫Barlitt。觐彤、觐槐是南屏乡亲起的名字。民国成立后，觐彤、觐槐遵父嘱回国参加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觐彤曾任矿冶工程师，觐槐任广州军政府军火局长，后来两人均卒于国内。

觐彤、觐槐的子女中，有一个女儿嫁给唐绍仪的侄子，其他的子女生活于美国。

容闳在美国大学毕业后获文学学士学位。1876年美国政府又授予他法学博士的学位。回国后容闳在清政府做官，开始官阶是五品，后来一直提升到二品。

容闳地位的提高对亲属和家乡影响很大。容闳哥哥达苗的两个儿子容尚谦、容尚勤成了中国官费的留美学生。在容闳的提携下，容氏家族赴美留学的不下一二十人。容闳的一个堂侄，后来当了民国副总统黎元洪的随从副官。族弟容星桥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对家乡的建设，也作出过较大的贡献。

二、学生时代

容闳的幼年，正是我国封建制度日益腐朽没落、西方殖民主义者加紧侵华的时代。与容闳故乡一水之隔的澳门，早在明朝时就有西洋商人寄住。明嘉靖年间，葡萄牙人占据澳门。西方殖民者的先锋队——传教士纷纷到澳门传教并创办学校。1835年英国教会为纪念传教士马礼逊来华传教“有功”，在澳门成立了一个“教育会”。由“教育会”开办“西塾”，西塾起初只收女生，后来兼收男生。容闳7岁那年，父亲送他到这里读书。这个“西塾”后来发展成马礼逊学校。

容闳12岁时，“西塾”因缺乏经费而停办。此年容闳因父亲逝世，容闳不得不辍学回家参加劳动。他每天到邻近的北山村贩卖糖果，有时跟姐姐到田间拾稻穗。有一次，他在田间对一位农民背诵26个英文字母，这位农民送给他一捆稻子。不久，容闳经邻居介绍，到澳门一家印刷厂做童工。

恰好在这一年，美国传教士布朗到澳门，在原来“西塾”的基础上办起玛礼

逊学校。该校首先招收原在“西塾”中读书的学生入学。于是，容闳又一次得到读书的机会。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英国人侵占了香港，马礼逊学校迁到香港，容闳也随校转到香港就读。

1847年，马礼逊学校校长布朗回国，他原是美国耶鲁大学的毕业生，返美时想带几名学生到美国深造。容闳因英文成绩很好，首先被选中，另外还有黄胜、黄宽（均珠海东岸村人）。他们乘坐美国运茶叶的帆船，绕道非洲好望角，穿越大西洋赴美留学。这就是中国近代第一批留美学生。

后来黄胜因病回国，黄宽则转到英国学医，只有容闳中学毕业后，继续攻读大学课程。

容闳先是在马萨诸塞州的孟松学校读书。该校相当于高中，实际上是大学的预科。学习期间，容闳聪明勤奋，颇受老师赏识。有一次，老师带着学生到海边，指着一块石碑，要学生们在涨潮前抄完碑上的英文。结果，绝大多数学生碑文尚未抄完，潮水已淹没了碑的下半部。正当大家望洋兴叹的时候，容闳首先交出他抄录的完整的碑文。原来，容闳是逆着碑文从下往上抄录的。因而，这位聪颖的中国学生很受老师和同学的赞誉。

由于中学学习成绩优异，容闳被一些美国人视为可以造就的有用人才。中学毕业后，有人愿出钱送他到英国学医，校董会想出钱送他继续深造，但规定学完以后必须回国传教。

容闳拒绝了这些限制性的条件，继续靠布朗的出力，得到一个妇女组织的资助，考上了美国著名的耶鲁大学。

容闳在耶鲁大学学习并不顺利。他的数学基础不好，时常担心会留级而被除名。经过较长时间的努力学习，才渐渐赶上来。他的学习费用也较缺乏，除了原妇女会的资助外，他有时到学生俱乐部采办膳食，有时到图书馆帮忙，半工半读，终于坚持到大学毕业。

1854年6月，耶鲁大学举行毕业典礼。有许多人从美国各地赶来，特地来看看这位在美国高等学府毕业的中国人，但是这时容闳的心情却十分矛盾：毕业后何去何从的选择摆在他的面前，这时他已经加入了美国国籍，参加了基督教会，留在美国，完全可以找到优越的工作；如果回中国去，清政府决不会重视这位“洋学生”，他的一套学识也绝不会受到社会的尊重。然而，他想起了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想起了他赴美时立下的“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的理想，他用中英两种文字写下了一句指导他一生的条幅：“其赤子之心，大人者不失”。他终于踏上了归国的旅途。

三、入世谋生

1854年冬，容闳经过154天的帆船漂泊，回到了香港，次年四月到达广州，这是他赴美八年后的第一次归国。他满怀理想，认为自己的一套，很快就会在祖国实施。他不懂得中国当时正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以为改造社会只是上层人物的事情，因此，开始就想通过外国人的介绍，进入官场，以实施他的救国计划。

在美国留学时，容闳就感到自己汉语的不足，在归国途中与船夫谈话时，更觉得自己汉语水平的肤浅，为了弥补这一点，他特地在广州补习了四个月。然后他到当时美国驻华代理公使伯驾那里当了书记，想通过他跻身中国政界。

这位伯驾正是1844年逼迫清政府与美国签订不平等的《中美望厦条约》的传教士，他对容闳图强中国的抱负并不支持，容闳只好懊悔地离开了他。容闳的生活遇到了困难，不得不先找职业谋生，边工作边实施他的救国计划，这就是他自己所说的“谋食亦谋道”。

容闳先在香港当了律师，但是英国人的利益不容中国人染指，很快被排斥了出来。他只好到上海另找出路，凭着外国传教士的介绍，进入中国上海海关当翻译。

英、美、法三国侵略者镇压了上海的小刀会起义，从清政府手中夺得了海关大权。清政府海关道不能直接管辖海关，海关总税务司必须由这三个国家的人担任，当时任该职的是英国人李泰国。容闳进入海关后，看到海关与外商勾结，贪污走私，十分不满，他问李泰国，中国人能不能担任总税务司，李泰国回答说绝对不可能，容闳气愤地提出辞职。李泰国很不高兴，但又想拉拢容闳，把月薪从一百两增加到二百两，容闳不为所诱，还是坚决离开了。

容闳一度失业，只好靠译书糊口。当时，《南京条约》签订后，上海划为“通商口岸”，对外“开放”外商云集，容闳的外语才能为外商看重，于1857年入英商办的宝顺洋行任书记。

容闳很有中国人的骨气。洋行经理托他当日本长崎分公司的买办，他认为“俸虽高，然操业近卑鄙”，不肯干，连经理也称，容闳虽然贫困，但“傲骨殊棱棱”。

一次，容闳在一家拍卖行里，背后一个高大的苏格兰人玩弄他的辫子，并要把它剪掉，容闳一气之下把这个洋人打得鼻歪眼斜，血流满脸，狼狈不堪。当时的上海，已有英租界，实为“国中之国”，洋人犯法，由英领事裁决，清政府无权过问，中国人受欺凌是常事。容闳这一行动，为中国人出了一口气，于是名声大振。

1857年黄河缺口，容闳向外商筹集了二万元，作为救灾之用。整个上海更加知道了这位耶鲁大学毕业生，许多人与他交了朋友，其中包括当时的数学家李善兰。

谋生的经历是容闳接触中国社会、了解民情的过程。容闳觉得，中国的现状，洋人当道，政府腐败，自己救民水火的愿望很难实现。他渴望有一个更适合的环

境来实施自己的救国计划，于是，他的眼光转向了太平天国。

四、天京献策

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以后，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也同时进行着。发生于1851年的太平天国，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以劳动人民为主体的反帝反封建斗争高潮。

容闳早在美国读大学期间就对太平天国运动表示同情。回国后的第一课，对他的教育又极其深刻。1855年，容闳在广州目睹了两广总督叶名琛镇压在太平天国影响下的天地会起义的惨状。叶名琛以“勾通太平军”的罪名，残杀了七万五千人，这对容闳这位出身贫苦的人来说，是很大的触动。容闳到上海后，经常有机会到太平军占领的区域采购茶叶，看到太平军占领区的人民能够安居乐业，因此产生了访问太平天国的念头。

1860年11月，容闳亲自访问天京（今南京），沿途受到太平军的礼遇。在天京，干王洪仁玕接见了。洪仁玕是天王洪秀全的族弟，在香港曾与容闳相识。干王接触资本主义，有很多改革的新思想，此时还主持天国的军政。容闳对着老朋友，毫不犹豫地干王提出了七条他思虑已久的主张：

- 一、建立正规化的军事制度，组成一支有纪律的军队；
- 二、设立军事学校，培养有学识的军官；
- 三、设立海军学校；
- 四、组织健全的政府，聘请有政治经验的人，充当各部门的顾问；
- 五、创立国家银行制度，订出统一的度量衡标准；
- 六、制定各级学校的教育制度，把《圣经》列为主要课程之一；
- 七、设立各种实业学校。

容闳的这些建议，包括了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反映了还在形成中的资产阶级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在此以前，还没有人提出过这种主张，因此，容闳这时的思想，可算是中国早期的改良主义者。

洪仁玕很赞赏容闳的建议，但是，当时太平天国忙于军事上的事务，加上太平天国领袖们的意见不很统一，干王也无法做主，因此容闳的主张无法实施，容闳感到很失望，辞谢了干王封给他的“义”字的官爵，又回到了上海。

后来，容闳对太平天国有了新的认识，他说：“当时即无洪秀全，中国亦不

能免于革命，恶根实种于满洲政府之政治。”承认了太平天国是“革命”。

五、在洋务运动中

容闳有一整套的改革理想，却找不到实施改革的依靠力量，只好在苦闷中徘徊。有一段时间，他索性不为宝顺洋行办事了，自己经营商业，想赚得一笔钱，用之发展资本主义。1861年他从太平天国地区回来后，在九江办了个专营茶叶的事务所，果然，获利不少。

但是干一番事业并不是有了几个钱就能办到的。正在这个时候，曾国藩请他去办洋务。于是，容闳被卷入了洋务运动的行列。

曾国藩是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起家的新的地主阶级当权派。1863年，奕訢、曾国藩等推行所谓的“洋务新政”，兴办一些军事工业，以维护腐朽的封建统治，这就是历史上的“洋务运动”。曾国藩为办洋务，收罗大批知识分子，容闳经李善兰介绍，当上了曾国藩的幕僚。

当时的容闳看不清曾国藩办洋务的本质，认为只要在中国办工业都是好事，因此在办洋务中相当卖力。另外，容闳还有个想法，就是想通过曾国藩实施他的“教育计划”。曾国藩想加强镇压人民的力量，首先要办军事工业，容闳的思想则认为应办民用工业，但当时又不得不迎合曾国藩的意图，于是委婉地提出办军事工业必须有机器，最好自己办个机器厂，曾国藩觉得主意不错，就派容闳去美国购买机器。

1863年，容闳再渡重洋，经过新加坡、法、英等地，又一次到了美国，他在美国奔波了两年，终于买回了一批机器，后来装备了在上海创办的江南制造局。江南制造局根据容闳的建议又附设了兵工学校和翻译馆，培养了一批近代工业技术人才。容闳自己也亲自翻译了《地文学》《契约论》等书。

曾国藩以容闳办“洋务”有功，保奏他当了五品候补同知，以后又担任江苏布政使的译员。从此，容闳正式跻身于官吏行列。

洋务运动从1863年到1894年甲午战争失败而彻底破产。其间，曾国藩已于1872年去世，洋务运动后期的主要人物是李鸿章。在洋务运动中，容闳以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立场为祖国做了许多有益的事。

1867年，他通过江苏巡抚丁日昌上书军机大臣文祥，建议创办一家华人资本的汽轮公司。1873年李鸿章创办的轮船招商局，就是这个建议的直接效果。

在他“筑路、开矿”主张的影响下，1878年李鸿章在天津开办了开平矿务局，1890年张之洞开办了汉阳铁厂及开采大冶铁矿。

当时，帝国主义除了用武力侵略中国外，还进行文化侵略，用精神鸦片——宗教来毒害中国人民。教堂遍布各地，传教士胡作非为，欺压百姓，清政府地方官

员不闻不问。作为基督教徒的容闳，虽未能认识宗教的反动作用，却反对教会干涉中国内政。他上书文祥说：“中国政府宜禁止教会干涉人民诉讼，以免引起纠纷。盖教会干涉诉讼，一方又损害法权也。”表现了他维护祖国主权的立场。

1873年，一个来自秘鲁的专使，在李鸿章面前大肆吹嘘，说中国在秘鲁干活的华工，营业如何发达，受到秘鲁政府如何优待，工资如何高厚等，李鸿章不知真假，特派容闳赴美洲等地考察。容闳带着两位美国友人，到了秘鲁、古巴等地调查，结果与秘鲁专使所说的完全两样，容闳看到华工受笞、受烙的斑斑伤痕，同情地拍了照片，并写了专题报告，寄回国内，戳穿秘鲁专使的谎言。

洋务运动破产后，容闳仍为兴办实业、发展中国资本主义而不懈努力。1896年，容闳提出了创办国家银行的计划，翻译了部分美国的银行章程，并取得了清政府户部尚书翁同龢、侍郎张荫桓的支持。正当容闳准备动身赴美考察的时候，买办盛宣怀到处贿赂顽固派官员，从中阻挠。大官僚张之洞、刘坤一也表示反对，结果容闳办银行的计划终于落空。1898年，容闳又提出了组织铁路公司、修筑天津至江苏镇江铁路的建议，清政府也批准了，这时，德国公使即出来“抗议”，说山东是德国的势力范围，铁路经过山东，德国不允许。害怕洋人的清政府，一听着了慌，马上“收缩”了，对此，容闳十分气愤，他大声疾呼：“自己的国家在自己的土地修铁路都不行，世界上哪有这样的法律！”

六、首倡留学教育

在容闳参加洋务运动的过程中，有一段他在美国负责留学生事务以及任中国驻美副公使的经历。

容闳从小就在外国人办的学校里读书，直到大学毕业，从未进过中国的旧学堂。在接受资产阶级教育的同时，容闳把资本主义的“文明”与国内落后的政治经济状况作了比较，逐渐产生了教育救国的思想。大学毕业前夕，他就认为：中国应该有千百个“容闳”，这些“容闳”脑子里装满了“西方文明”，回去改革中国的政治和经济，事情就好办得多了。于是，他有了一个组织大批青年赴美留学的计划，容闳为实施这个教育计划而百般寻找机会。

1868年，他通过上司丁日昌上书清政府，提出了向美国派遣留学生的主张，书札送到军机大臣文祥那里，正遇上文祥父丧回家守孝，事情被搁置。

1870年6月，天津天主教育婴堂发生中国婴儿大批死亡事件，群众前往质问，法国驻天津领事用枪恐吓群众，群众一怒之下打死包括法国领事在内的二十多外国人，这就是“天津教案”。清政府面对七个侵略国家的“抗议”和军事威胁，赶忙派曾国藩、李鸿章和丁日昌去处理“教案”，容闳作为丁日昌的下属和翻译参加处

理这个案件，因而有机会再次与曾国藩见面。容闳向曾提出了分期分批向美国派遣留学生的建议，这个建议正与曾国藩办洋务需要人才的情况相符。于是曾国藩同李鸿章商议，将容闳的建议报奏清廷，并得到批准。况且当时中美有一个《续增条约》，其中规定允许中国人到美国读书。容闳听到派遣留学生的建议被清政府批准，欣喜若狂，夜不成寐，“竟夜开眼如夜莺，觉此身飘飘然如凌云步虚，忘其为偃床第间。”

清政府批准容闳的教育计划是：四年内每年派 12 至 14 岁幼童 30 名共 120 名到美国留学，学费由政府提供。

容闳马上着手办理招生事宜，在上海办了个预备学校，先招第一批 30 名，后来名额不够，容闳又回广东、香港招生。名额凑足后，容闳于 1872 年提前到美国安排。这 30 名幼童由刑部主事陈



第三批留美幼童出发前在上海合影

兰彬（广东吴川人）带领，从上海到东京再转轮船往美国。这是中国近代留学教育的开始。

1875 年，四期留学生都到达了美国。起初清政府对留学还颇重视，在美国哈特福德城的哈林街，专办了个留学生事务所，并任陈兰彬、容闳为负责留学生事务的正副委员。

清政府选派留学生，本来是培养为他们服务的奴才，但事与愿违，这些幼童到美国后，渐渐被“洋化”了。留学生们原来受封建教育较少，出国以后完全接受西方的文化教育，他们组织棒球队，参加基督教洗礼，改穿西装，有的还索性剪掉辫子。容闳对此不加管束，监督陈兰彬虽不满意，但也不好发作。后来清朝派去了一个新监督吴嘉善，他接连向国内报告，说留学生在外国不成“体统”，长此下去，“中学”将废。本来对留学教育就没有真心实意的李鸿章，这时也渐渐公开反对。早在 1875 年，清政府将陈兰彬改任为驻美公使，容闳调去当“副使”，实际上架空了容闳对留学事务的管辖权。1881 年，清政府决定取消留学事务所，撤回所有的留学生，这样从 1872 年到 1881 年，留学教育仅办了十年就半途夭折。其时，

除了詹天佑、欧阳赓两人大学正式毕业外，六十名留在读大学，其余尚在读中学。

这时，容闳还想作最后努力，他联络了美国教育界的知名人士，由耶鲁大学校长朴德出面，写信给总理衙门，但也无济于事。“教育计划”破产后，容闳曾感到十分颓丧，几乎绝望了。但是尽管封建顽固势力扼杀了这次留学教育，却不能制止留学运动的发展。经容闳首倡之后，出洋留学已成了一种社会风气，后来留日本的越来越多，许多留学生成了推翻清王朝的骨干。在这方面，容闳是有重要贡献的。

《中国近代留学史》指出：“欲述留学生之渊源，不可不先知容闳。”

后来，在这批撤回的留学生中，涌现出了许多有影响的人物。詹天佑成了著名的爱国工程师，容闳的族弟容星桥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唐绍仪、梁敦彦、唐国安分别当了总理、外交总长、清华大学校长，还有人当了海军司令，舰队司令。有七人在中法、中日战争中为国牺牲。

七、家乡之行

1855年4月，容闳从美国回到香港不久，即返回家乡，探望白发苍苍的母亲和阔别八年的哥嫂以及各位乡亲。容闳回家时，穿着西装并按欧美人的习惯蓄着胡子。母亲见容闳平安归来，非常欣慰，但当她见到容闳蓄胡子时，对他说：“汝上有一兄尚未蓄须，故吾意汝去须为佳。”容闳立即遵从母命，剃去胡子。由此可见，这位深受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教育的青年，仍然没有抛弃中国的民族传统观念。这种孝敬父母、眷恋故土的质朴感情，正是他爱国主义精神的一种体现。

1871年冬天，容闳又一次返回家乡。容氏大祠堂的院子里，整天挤满凑热闹的人们，他们既是来看望久别的容闳和祝贺“甄贤社学”的兴办，又是欢送容氏家族的子弟——容闳哥哥的儿子容尚谦去美国留学。容闳参加办洋务，当了清朝的官员，这次回家是挂了“钦差大臣”的头衔到香港招收留美幼童的。当然，容闳不会放过这个为家乡出力的机会。于是他的侄子当选了，同时还有香山县籍的11名幼童也被选为留学名单之中。

这时，容闳从经营茶叶中已赚了一些钱，现在又做了官。但是他不买房屋，不置产业，他住在祠堂里，盘算着用这些钱办另一番事业。

南屏容姓自古以来没有学堂，只有一个从乾隆嘉庆年间沿袭下来的“甄贤社”。这是一个封建迷信的团体，它虽然每年也拿出若干钱，为考科举的子弟供二三两银子作“膏火费”，但能够参加科举考试的只能是极少数，更何况当时科举制度的腐朽本质已暴露。有志于教育事业的容闳见此情况，心里十分着急，他通过族长出面，把乡亲们召集起来开会，向乡亲们提出了办一个“甄贤社学”的建议，并首先捐献了五百两银子。

这所义学后来不断发展，民国时期发展成了很有规模的甄贤学校，南屏乡亲立碑纪念容闳，把他的像挂在学校里，同孙中山的像挂在一起，一直到抗日战争前夕。

1896年，容闳在苦闷中生活。两江总督张之洞给他个“交涉委员”的头衔。但有职无权，无所事事。于是，他带着妻子郑氏，以及在上海出生的长子若兰返回南屏。

这时的若兰25岁，已届结婚年龄，容闳给他找了个妻子，是附近北山村的一位富家女儿。若兰结婚的日子，也是他回乡“入族”的日子。根据族规规定，在外地出生的容姓人，必须回家乡报告出生日期，并由族里定族名。若兰原名是容申（上海出生之意），族里根据“兰”字辈取名为“若兰”。

据说，容闳在美国出生的另外两个孩子也是在这次“入族”的，族里给他们取名为“咏兰”和“嘉兰”，乡亲们又以祠堂前的一棵桐树、一棵槐树为由，把咏兰称为颀彤（同桐），嘉兰称为颀槐。

当时北京的维新运动正在酝酿着，关心国事的容闳，办完若兰婚事后，赶忙上了北京。

1902年，74岁高龄的容闳最后一次返回家乡。这时他已不再是清朝的官员，而因参与策划自立军起义，被清政府列为通缉的要犯。容闳在国内待不下去，想再到思念的美国去。临行前夕，他再回到童年生活的家乡。侄孙容联芳来看望他，看见他白发苍苍，但仍旧精神矍铄，处处表现出对国事的关心，心里十分敬佩。

这时，经容闳倡办的甄贤社学正在不断地扩建，准备办成新学堂，同时受甄贤社学的影响，南屏各姓也办起了自己的义学。于是容闳提议，在屏岚园办一个中学，让南屏、北山等地的子弟可以进一步深造。

消息传到附近的村庄，北山村一位退职的游击将军杨貽驪出来反对，派人到处散布说：“屏岚园办中学破坏风水！”结果，容闳的提议受阻，只好怅然而别，到美国去了。

八、从维新到革命

1881年，中国留学美国的学生全部撤回后，不久容闳也由驻美副公使任满回国。

美国的妻子克洛以为容闳被清政府召回国内治罪，忧虑成疾，容闳得知消息后，只好又赶去美国。妻子几经救治，终于1886年逝世，遗下两个幼孩，一个九岁，一个七岁。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政府在“洋务运动”中苦心经营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洋务运动彻底破产了。侨居美国的容闳听到中国战败的消息，又激起

了他的爱国热忱，他写信给两江总督张之洞，要他制定与日本长期作战的计划，建议向英国借款，雇佣外国军队从背后袭击日本。果然张之洞真的叫他去英国借钱。



晚年的容闳在美国寓所

当时，清政府仍把主要精力放在镇压国内人民的反抗上，对外来侵略是不想抵抗的，他们正想与日本求和，由于英国与俄国的矛盾暗地里也向着日本，容闳的借款之行结果一无所得。

张之洞电邀容闳回国，容闳把两个孩子交托给克洛女士的姑母，1895年夏天，又一次回到中国。

容闳回国后，再一次重复他那实业救国的主张，建议实行新政，派中国青年跟外国人学习等。张之洞认为容闳言辞激烈，置之不用，只给了他一个“交涉委员”的空职。

容闳又先后于1896年、1898年提出了创办国家银行，建设津镇铁路的计划，前一项因盛宣怀破坏，后一项因德国抗议都没有实行。这时，康有为、梁启超发动的改良主义运动正在兴起，

早就认为中国必须改革政治的容闳，自然成了维新运动的一员。

维新运动的领袖康有为、梁启超很赏识容闳，他们觉得容闳的开银行、办铁路的主张正好与自己的“新政”不谋而合。而容闳对外国情况的谙熟、丰富的经验以及成熟的政治见解，也使康、梁十分尊重。维新党的领袖们，经常到容闳的住所商讨大事，容闳的住所一时成了维新党人的“会议场”。

维新运动只不过昙花一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封建顽固派，软禁了光绪皇帝，捕杀谭嗣同等“六君子”，下令通缉维新党人。容闳见情况紧迫，匆忙跑到美国使馆请求他们搭救康有为、梁启超，自己则奔到上海，在租界中躲避。

康有为、梁启超逃到外国后，国内的维新运动余波未平。1900年7月，唐才常在上海成立“自立会”（亦称“中国国会”），参加者有当时的名流八十余人，会上举行选举，容闳得票最多，被选为会长，严复次之，为副会长，唐才常当总干事。国会的宗旨是组织新政府，拥立光绪皇帝重新执政。会上，容闳起草了英文宣言，并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连参加会议的章太炎也感到：七十多岁的老人，还这样关心国事，真是中国少有。

但是，自立会的活动也成不了气候。唐才常在武汉组织自立军，准备武装起义，但不到一个月，就被张之洞捕杀了。容闳被通缉。

正当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在政治舞台上与封建势力竭力搏斗的同时，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也在形成之中。1894年，孙中山在美国檀香山组织了兴中会，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宗旨，并且开展了一系列反清活动。

在康有为、梁启超从资产阶级改良派转为保皇派后，容闳由原来的康梁之友转到了支持孙中山的立场。

1895年以后，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在香港设立总部，香港成了革命党人反清的一个基地。1900年，原留美学生、容闳的族弟容星桥，正在香港为孙中山办报纸，容闳通过他与兴中会取得了联系，尤其是与兴中会员、爱国华侨谢纘泰交谊更深。

1900年9月，容闳赴日本，在轮船上与孙中山不期而晤，两人一见如故，孙、容两人一起在日本走访了许多朋友，共商反清事宜。在容闳的印象中，孙中山很像美国的华盛顿、富兰克林。孙中山认为容闳有新思想，是热心改革中国的老前辈。于是两人建立了友谊。

腐朽反动的清政府时刻都想把革命扼杀在摇篮中。孙中山自从反清活动以来，在国内一直受通缉，只好在国外开展革命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容闳由于参与了唐才常自立军起义的策划，清政府也一直不放过他。1901年，香港兴中会总部的重要负责人杨衢云被清政府派人刺杀，容闳认为香港也无法安身，于是想再次去美国。

1902年5月，容闳乘轮赴美，临行前，他再三叮嘱前来拜访他的刘禹生：中国现在的斗争与美国独立战争一样正义，我已经老了，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希望你们多做实际工作，“有为中国人之心，即日应办中国人之事”。

这时候，容闳对劳动人民斗争的历史作用，也有了新的认识。他对1900年发生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有很高的评价，他对刘禹生说：“（义和团）此中国之民气也，民无气则死，民有气则动，动为生气，从此中国免瓜分之局。”这种评论与中外反动派把义和团称为“作乱”“拳匪”的诬蔑形成鲜明的对照。

容闳踏上了美国大陆后与谢纘泰一直保持通信联系。谢纘泰致信容闳，请他发动美国友人支持中国的革命斗争，容闳表示应允。

当时，资产阶级中革命与保皇两条阵线还未鲜明，孙中山组织反清活动曾一度想邀请康有为、梁启超参加。这时容闳与康、梁的关系也很密切。1903年和1905年，康有为、梁启超分别来到美国，会见了容闳，梁启超说容闳“舍忧国外，无他思想，无他事业”。1907年，孙中山通过《民报》阵地，发动了向保皇派的革命大论战，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就在同一年，容闳宣布与康、梁决裂。1909年，孙中山旅居新加坡，容闳与孙中山通信频繁，成了孙中山革命事业的同路人。

容闳一直惦记着自己发动美国朋友支持中国革命的诺言。有个叫荷马·李的美国人，对军事很有研究。还有个布司，是美国西部财界人士，这两人以前都与康有为、梁启超有交情，容闳写信叫他们转向支持孙中山，并介绍孙中山与他们取得了联系。

1910年3月，孙中山到美国，在洛杉矶与荷马·李、布司等人见面，并制定了武装起义的《红龙计划》。同年4月，孙中山特地赶到容闳居住的哈特福德城，拜访这位老朋友。1912年1月，孙中山带着荷马·李回南京。他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还十分怀念容闳这位“老同志”。

1911年5月，容闳突然中风，卧床不起，生命进入了最后的时刻。辛亥革命一声炮响，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被赶下了历史的舞台，消息传到美国，容闳拖着疲乏不堪的病体，连连给谢纘泰写了三封信，可见当时的心情何等喜悦。容闳告诉谢纘泰等身体状况好转，就回国看看辛亥革命后的新气象，其间，并想结识一些与孙中山共事的其他领导人。

当时国内在举行南北议和的谈判，容闳的学生唐绍仪当了袁世凯的谈判代表，容闳对这件事很关心，他写道：“目前最使我焦虑的是掠夺成性的列强在北京，将有压倒一切的力量，左右袁世凯、唐绍仪一伙；他们将使用一切手段，影响上海的制宪会议，通过君主立宪，并以袁世凯、唐绍仪控制新政府，那简直就如清朝政府一样糟糕。”为此，他大声疾呼：“一点儿不要相信他们这一套，一点儿也不要相信袁世凯通过他的喉舌唐绍仪对你们说的话……”

1912年1月，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权——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革命中诞生，孙中山在任职临时大总统时，很想念这位在美国的老朋友，他特地写信给容闳，请他回国参加国内新的斗争，并寄去一张相片。信中写道：“当此破坏后，民国建设，在在需才。素仰盛名，播震寰宇，加我才智学识，达练过人……恳请先生归国，而在此中华民国创立一完全政府，以巩固我幼雅共和”。

这时，容闳已处于昏迷状态，但当他得知孙中山来信内容后，鼓励身边的两个孩子说：你们回国吧。在美国长大、并且已经都是耶鲁大学毕业的邬彤、邬槐，感到十分突然，对父亲此举很不理解，他们觉得自己在美国都有工作，待遇优厚，为什么要回中国受苦呢？儿子支支吾吾的态度使容闳有些生气了，他说：“我培养你们，原希望就是回报祖国，现在你们如此患得患失，太辜负我的愿望了。”说得两个孩子惭愧地低下了头。后来，邬彤、邬槐终于感于正义，遵循父亲的遗训，回到了中国。

1912年4月12日，容闳逝世于美国哈特福德城的寓所。消息传出后，反响强烈。《纽约时报》《哈城日报》都作了报道。他的好友、牧师特韦契耳为他主持了葬礼。特韦契耳对容闳的评价是：“他（容闳）从头到脚，身上每一根神经纤维都是爱国的……”

（原刊载 1982 年，《珠海文史》第一辑）